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报告

2018

-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
国家创新基地(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I 主编的话
吴晓明
- I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2018)
- 2 总报告
王凤才 刘利霞
- 29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研究报告 (2018)
- 30 德 国
周爱民
- 56 法 国
吴 猛
- 75 意大利
李凯旋
- 94 西班牙
贺 钦
- 108 英国
鲁绍臣
- 128 澳大利亚
孙秀丽 R.博尔
- 144 美 国
贺 美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庞亚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8 /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编.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01-020409-3

I. ①国… II. ①复… ②复… ③复…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国外—2018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29660号

书 名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8

GUOWAI MAKESIZHUYI YANJIU BAOGAO 2018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印 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9.5

字 数 49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20409-3

定 价 90.00元

澳大利亚*

孙秀丽 R. 博尔

由于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其独特内涵，并带有强烈的本土特征。就内容而言，它大致可以分成以下特殊类型：深受英国传统影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聚集资本主义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澳大利亚本土问题的政治批判研究；以及关注“执政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等方面。除了这些最主要的分组之外，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其他路径也在继续发展。这些研究焦点一般存在于某所特定大学或者独立组织之中，而且，许多碎片化的左派政党也出版了自己的刊物。

总体而言，许多老一代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仍然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这一奇怪区分也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其中托洛茨基被认为是某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一趋势，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这一看法正在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研究范式和假设。下面确认的几条路径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规划基金（20171140021）阶段性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澳大利亚哲学家一直有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很感兴趣的传统，但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需要指出的是，在澳大利亚各大学中，一个普遍的模式是每个系拥有一到两个代表性的独立研究领域或研究路径。历史系和历史学院在人文社科中一般大于其他专业或学院，这是因为历史在澳大利亚的民族思想论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为了理解澳大利亚的国家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去讲述过去的历史？它是带有“西方”价值的欧洲殖民的故事？还是关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并在最近遭受严重殖民破坏的连续文化的解释？抑或它是一种有关东南亚与更早期的马六甲和中国联接的交往叙事？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它们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但是如何强调和评价它们则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墨尔本大学的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就指出，澳大利亚共产党对理解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社会历史而言很重要^①。另一位以前也在墨尔本大学工作的维尔蒂·斯伯格曼（Verity Burgmann），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劳动历史和社会反抗运动方面的研究，并著有《21世纪的全球化和劳动》（2016）。其他学者则更加关注全球史，尽管他们探究的主要是澳大利亚在世界中的角色。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比如悉尼大学的格雷厄姆·吉尔（Graeme Gill）教授和纽卡斯尔大学的罗杰·马克威克（Roger Markwick）教授。吉尔教授在许多方面有着洞见性的研究，例如，他探究关于斯大林、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以及后共产主义的政治，并于最近出版新著《苏联政治的集体领导》（2018）。马克威克则研究苏联历史学的本质，以及女性尤其是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在红军中所具有的重要角色。

回到哲学以及纽卡斯尔大学，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的哲学系一般很小，而且历史上一直存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种哲学路径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留有很小的空间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悉尼大学的瓦尔·萨

^① 参见 Macintyre, Stuart. *The Reds: The Communist Party in Australia from Origins to Illegality*. St Leonards: Allen and Unwin, 1998.

奇汀 (Wal Suchting, 1931—1997) 是一个例外, 萨奇汀是澳大利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他深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逻辑) 哲学的关系, 代表作有《马克思与哲学》(1986)、《重构马克思主义》(1933) 等。尤金·卡门卡 (Eugene Kamenka, 1928—1994) 也推进了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究。1937年, 他作为纳粹集中营的难民与父母来到澳大利亚, 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求学。随着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1969) 的出版, 他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理论的探究, 试图建立马克思所忽略的规范伦理学观念。另外, 他还强调将“自由联合”作为马克思革命规划的基础以及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价值。虽然卡门卡没有为自由联合体观念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 但在20世纪70—90年代, 促进了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问题的探讨。另外还有萨奇汀的学生、属于学派成员的伊安·亨特 (Ian Hunt), 他是澳大利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 代表性著作有《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① (1993)。亨特通过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加以辩护, 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批判进行了重新阐释, 并探究当代西方工人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总体而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澳大利亚学术研究中仍处边缘, 纽卡斯尔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 在正式的制度结构之外, 必需建构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

以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 为例, 有许多要素为这种独特路径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首先, 该大学坐落在一个传统的工人聚集区, 并拥有一个主要港口、矿山、工业以及左翼贸易联盟, 这一事实提供了一个更容易接受左翼政治的环境 (在这些方面, 澳大利亚共产党一直具有很强的影响); 其次, 该学校具有50多年的历史, 它建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澳大利亚的繁荣时期, 所以它不受国家或联邦首都城市中古老大学的期待和限制, 从而具有探究替代性路径和观念的空间; 第三, 一系列不同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 能够使得马克思主义网络得以发展。这一网络包括历史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等; 而且, 无论是在拉美、苏联、中东或者东亚, 他们每个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提供了独特的社会主义研究路径。例如, 汤姆·格里菲斯 (Tom Griffiths) 继续推动拉美社会主义政府下的教育实践,

^① 参见 [澳] 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 徐长福、刘宇等译, 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评估政策、实践或者成果，从而致力于改进这些路径，并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逻辑：参与危机、不安全和不确定性》（2013）、《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视角》（2016）；同样，无论在教育还是在解放本质方面，萨拉·莫塔（Sara Motta）都提供了有关拉美社会主义偏重社会学角度的分析，她的研究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交叉，并新近出版《阈限主体：编织（我们的）解放》（2018）一书；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执政的社会主义”问题，即探究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试图在复杂而且有时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历史学家罗杰·马克威克（Roger Markwick）和 E.C. 伦·卡尔多纳（Euridice Sharon—Cardona）比较关注苏联历史，但他们的著作同样也包括上述方面的研究。

最后，罗兰·博尔（Roland Boer）的著作则采用更加哲学的方法。鉴于西欧文化深受宗教的影响，博尔的著作最开始处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复杂交织性问题。他的“天国批判和世俗批判”系列五部著作于 2014 年获得艾萨克和塔玛拉德国纪念奖，到目前为止是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澳大利亚学者。后来，他的著作开始关注列宁和斯大林，并仍然在哲学和宗教的交叉方面进行研究，但这一研究敞开了执政的社会主义的整体领域。列宁，尤其斯大林的著作在十月革命后出现，那时布尔什维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这一思考使得罗兰·博尔关注中国的境况，并准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方面，以及继续展开“执政的社会主义”研究项目。这一项目包含纽卡斯尔大学的其他合作者以及中国的一些主要研究人员，该项目主要考察诸如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政治政党尤其共产党的角色、教育政策和实践、伦理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新形式。

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批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关于中国的研究，早期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格里菲斯大学退休教授尼克·奈特（Nick Knight）。奈特的研究关注的是中国早期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他出版了关于毛泽东 1937 年“辩证唯物主义”讲座文本的批判性评价，并结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进行分析。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对这些著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在《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1993）一书中，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伊安·亨特也专题讨论了毛泽东的矛盾理论，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此外，澳大利亚有着诸多中国研究机构，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墨尔本亚洲语言与社会研

究所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澳大利亚学者关注的方面之一。

二、文化马克思主义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许多澳洲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受欧洲，尤其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影响。其中，威廉斯及其学生伊格尔顿在澳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另一思想来源还有布达佩斯学派。20世纪70年代卢卡奇去世后，受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赫勒和费赫尔夫妇、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夫妇移居澳大利亚，并在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拉筹伯大学等地任教，他们的思想也在澳大利亚得以传播。以其为代表的布达佩斯学派从“复兴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主题出发，围绕现代性危机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其中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影响了一批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秉承布达佩斯学派传统，以澳大利亚本土经验为参照，注重在文化生活层面对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

首先，一些学术杂志的出现可以看出这一研究的侧重，其中《论纲十一条》（*Thesis Eleven*，又称《批判理论和历史社会学杂志》）就是首要例子^①。20世纪80年代，《论纲十一条》在拉筹伯大学创立。《论纲十一条》重点关注文化研究和文学，同时也扩展性地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此外，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出发，该杂志也出版地域性理论、调查、批判、争论阐释，以及与当今世界有关的问题，鼓励文化分析和现代性替代方案研究。例如2016年4月期杂志以“批判的政治与政治的批判”为主题，深入讨论和反思现代性问题。该杂志也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及其传统，包含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从新近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这一研究侧重。例如，2014年12月期以“赫勒：哲学组曲”为题，包括“论赫勒的美学纬度——从‘复活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范式”、“在存在与文化之间——论赫勒”等一系列围绕赫勒哲学思想的纪念文章；2018年2月期以“悖论、冲突、辩证法和和解”为主题，其中包括“文化悖论与现代性批判”、“作为‘真诚进步’的乌托邦”、“作为社会行动的恶”等文章，讨论有关马尔库什、阿多尔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

^① 参见：<https://thesiseleven.com/>。

其次，鉴于该杂志最初的成功及国际关注，它导致了拉筹伯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2001年，拉筹伯大学创立了“论纲十一条文化社会学中心”（*The Thesis Eleven Centre for Cultural Sociology*），2007年改为“论纲十一条批判研究中心”。该中心声称“批判理论是主要的资源和传统，但文化社会学是关于我们正在以及将要做什么的更加宽泛的描述”，旨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这一文化关注也意味着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出现在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学系和语言系中。例如，早期的突破出现在悉尼大学的法语系，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米亨·莫里斯（Meaghan Morris）和保罗·巴顿（Paul Patton）开始了具有影响力的工作，其中，莫里斯是首位以“翻译福柯理论和支持法国理论”^①著称的澳大利亚人。莫里斯与巴顿合作编辑《福柯：权力、真理和策略》（1979）等著作，他们的研究融合法国后结构主义（福柯和德里达）的早期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伴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伊利格瑞等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和介绍，20世纪60年代左右，法国思想在澳大利亚学界得以传播。之后，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带有文化政治的维度，借以讨论权力压迫、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是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文学比较中心，后来改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莫纳什大学一直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主要阵地，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有：（1）从英国移民到莫纳什的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受威廉斯和伊格尔顿著作的影响，米尔纳出版了涉及科幻小说、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的著作，例如，《重新理解文化研究》（2002）、《文学、文化和社会》（2005）、《定位科幻小说》（2012）等。在书中，米尔纳继承威廉斯及其后继者的遗产，追溯文化唯物主义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他也强调威廉斯与霍加特的区分，认为不能将“文化主义”的标签轻易地贴在他们身上。米尔纳认为，威廉斯与英国的文化主义传统之间的根本关联，就像巴迪欧和福柯之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哈贝马斯之于德国批判理论的关系。因此，文化马克思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后文化主义”，而不是文化主义。（2）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著有《澳大

^① Felski, R. & Sofia, Z.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eminism'". *Cultural Studies*, 10, 1996, p. 385.

利亚共产党简史》(1969)的阿拉斯泰尔·戴维顿(Alastair Davidson),他比较重要的贡献是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思想介绍给澳大利亚学界,并担任《澳大利亚左派评论》(*Australia Left Review*, 1966—1993年间由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发行)、《干预》(*Intervention*, 1971年在墨尔本开始发行)以及《论纲十一条》等澳大利亚主要左派杂志的编辑。(3)鲍里斯·弗兰克尔(Boris Frankel)的贡献则在于研究哈贝马斯的早期思想以及写作《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78)、《超越国家?》(1983)以及《后工业乌托邦》(1987)等。跟戴维顿一样,他也致力于澳大利亚学术与西方思想的联结。(4)扎达尔·河内(Zawar Hanfi)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向澳大利亚学界翻译和介绍费尔巴哈、弗洛伊德、马克思、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21世纪中叶,莫纳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关闭,这也暗示澳大利亚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的逐渐没落。

第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本土特征,代表者有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米亨·莫里斯、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托比·米勒(Toby Miller)等人。1983年,菲斯克、特纳等人合力创办《澳大利亚文化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他们致力于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承认和挖掘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和重要性,并基于左翼立场批判性地考察这些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经济文化议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德·赛托等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伯明翰学派的“葛兰西转向”、威廉斯后期文本中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批判,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德国后现代学者韦尔施主导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其主要思想来源。例如科廷大学的约翰·菲斯克教授致力于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电视文化》(1987)、《理解大众文化》(1989)等著作中,菲斯克分析媒介作为一种“文本”所蕴含的不同意义层面和社会文化内涵。另外,他还将后结构主义传统的符号学应用于媒介分析,并具体考察这些文化内涵在社会中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其中涉及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复杂交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等文化研究机构的消失,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并日渐成为“三A轴心”^①之一。这一方面源于英美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影响,因而它带有某种程度的“英国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也试图跳

^① 参见徐德林:《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

出这一框架，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叙事和独特风格。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 Davison）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1984）一书形象地揭示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复杂交织的特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转向”中，可以确认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20世纪70年代欧洲“左翼”的兴起，“文化转向”本身是对广泛的世界反殖民运动的一个回应，同时也意味着欧洲殖民主义特殊阶段的终结^①；二是西欧和北美共产主义的革命可能性逐渐消失。与之更加密切相关的是苏联“背叛”了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不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不用说是共产主义。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的西方殖民主义理论框架，这一理解也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托洛茨基理论框架的一部分，其结果便是将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和经济分析转向对文化的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

然而，这一文化研究侧重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特征也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在被忽略。因而，他们抨击文化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现象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对文化的强调逐渐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注。

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发展是这一转变最明显的信号，这一历史可追溯至几十年前：在20世纪70年代，与对数学、微观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机制描述的新古典关注一致（那时可被视为学科的一种“美国化”），悉尼大学管理层尝试全面改革大学的经济学科^②，这需要采取制度化的形式以拒斥这些发展。最终2007年，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建立。这主要是因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真正失去势头^③。第二年，该系从商学院转移到了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

那么，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从该系网站上可以看到，它关注的核心是：经济现实并不“独立于社会和历史进程”而存在，“市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London: Verso, 2008. pp. 483-515.

^② 参见 Weintraub, E. Roy. *How Economics Became a Mathematical Sci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参见 Schroeder, Susan, and Lynne Chester, eds. *Challenging the Orthodoxy: Reflections on Frank Stilwell'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 Springer, 2014.

场”不能与诸如“全球化变化”的社会环境要素分开，“经济活动、财富和机会”如何进行集中，“自由市场视角”和“更广的社会关注”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与环境持续”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此外，还提及能源、劳动、性别、种族、公共政策以及人权等方面，但并未提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出现在一个涉及研究专长的介绍中：“该研究规划被广泛地认为是参与以及致力于非正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有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以及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该研究认为，不同的理论经常是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的。我们的理论所了解的经验研究试图提供有关当代问题和政策的批判性分析，并建构针对正统观点的替代性方案。”^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明显被掩盖在一系列其他研究路径之中。尽管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路径被视为“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的”，但总体研究不应该被视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分析其他阐释路径的基本框架，所以他们倾向于用“非正统”来称呼自己的研究路径。这一术语来自基督教传统，其中“正统”意味着“正确的教义”，“非正统”则意味着“异端学说”（这一词汇最开始来自古希腊）。换句话说，悉尼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关注这样的经济理论，它不属于在其他地方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路径，当然，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些经济理论中的一种。

通过参考《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ustralia Political Economy*），可以获得有关政治经济学系研究侧重的其他视角。该杂志最先于1977年发刊，它主要关注的是促进“针对传统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替代方案，并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挖掘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促进有关资本、劳动、生态和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论争。”^②这一描述涉及一些很重要的点。首先，它为“传统”经济学提供替代性方案（复数）。这一点呼应前面提到的对“非正统”的自我解释，并通过运用“正统”继续暗指基督教历史。在最近一期的杂志（第80期，2017—2018年夏季刊）中，它继续将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或简单经济学称为“正经”经济学，并按内在要求自称“非正统”经济学。这一描述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探究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无论是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抑或是全球资本主义，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

^① 参见 http://sydney.edu.au/arts/political_economy。

^② 参见 <http://australianpe.wixsite.com/japehome>。

义的传统，集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当然，这一杂志以及政治经济学系不是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唯一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杂志，例如《劳动与工业》(*Labor and Industry*，格里菲斯大学)和《澳大利亚劳动公告》(*Australia Bulletin of Labor*，南澳大学、佛林德斯大学)等。此外，该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1) 写作《建构资本主义》(1989)一书的安德鲁·威尔斯(Andrew Wells)。在该书中，威尔斯探究了东澳的经济史，揭示了澳大利亚如何从1788年的巨大和孤立的监狱发展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强调土地政策、劳动市场以及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 澳洲国立大学的科斯马斯·特索卡斯(Kosmas Tsokhas)教授，代表作有《市场、货币与帝国：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政治经济学》(1990)、《成为民族国家：澳大利亚历史的文化认同、经济民族主义与性别》等书。在书中，他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视角探讨澳大利亚的现状和历史。(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里克·库恩(Rick Kuhn)。2007年，他因《亨利克·格罗斯曼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2007)被授予艾萨克·多伊彻与塔马拉·多伊彻纪念奖(the Isaac and Tamara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该奖项奖励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最具创新意义的著作。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最初来自波兰，后来在东德的莱比锡大学工作。他最开始是个经济史学家和统计学家，通过严重依赖数学公式，他提出了运用积累理论和崩溃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新角度。他认为，经济崩溃趋向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外表来推断。库恩通过研究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直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

回到《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一方面，我们或许会理解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强调是编辑的选择，同时，从一个“非正统”的视角来讲，当然也存在很多可用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注同时也是马克思后期著作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在《资本论》三卷本中可以看到，更不用提马克思的其他相关文本。奇怪的是，该杂志很少有文章具体讨论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的路径。不过有一个例外，在总第70期(2012—2013年夏季刊)中，鉴于最新发展，这一期关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那么，这一杂志在1977年开始的时候是否更加关注马克思主义？经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最初三期的文章甚至展现出更少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即使后面的文章也很少。

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关注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假设我们必须挑战资本主义并试图改变它。那么，正如《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学杂志》总编、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史迪威 (Frank Stilwell) 所讲的，该杂志“一直拥有一个公开的目的，即有助于进步的社会改变”^①。他注意到，“一些斗争一直存在于大学校园里，这是因为学生和持不同看法的学者试图寻求主流经济学教育的替代方案”，但也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其他混合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平等以及生态不可持续的政治实践的更广范围的斗争。”在这方面，这种关注本身即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当然，这些斗争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们也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很少有真正的替代方案。但在澳大利亚左翼学者那里，这种探究和斗争一直持续。

四、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批判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外一个特征跟不同的左翼政党和组织相关。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较快的国家。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左翼运动对澳大利亚左派具有深远影响，且在最初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对澳大利亚学界来说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左派中的大多数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注，并出版相关研究杂志，致力于寻求一个更好的社会。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左翼组织和杂志。首先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及其出版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② (*Australian Marxist Review*)。1920年10月30日，澳大利亚左派和社会主义小组在悉尼召开会议，成立社会主义政党，人数仅26名。^③后来，社会主义政党经历几次分裂，并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解散。1996年，它重建后改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共产党是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组织，讨论受马克

^① 在关于杂志角色的反思中，编辑弗兰克·史迪威 (Frank Stilwell) 指出这些内容。参见 <http://australianpe.wixsite.com/japehome/single-post/2016/1/27/Food-for-Thought-The-Journal-of-Australian-Political-Economy>。

^② 参见 <http://www.cpa.org.au/amr>。

^③ 参见蔡声宁：《马克思主义在澳大利亚》，载《社会主义研究》1985年第5期。此文是国内可查阅的关于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早介绍。

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影响的意识形态。该政党的理论在澳大利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有其独特性，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通过革命从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国家独立是努力实现澳大利亚社会主义的首要步骤。另外，该政党强烈关注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语境的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时，关注本国社会政治。^① 它声称，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工作包括消除贫困、社会不正义、无家可归、种族主义和战争等，目的在于维护工人和原住民的权利、促进澳大利亚的社会进步。

其次是社会主义替代 (Socialist Alternative) 及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评论》(Marxist Left Review)^②。社会主义替代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于1995年。它倡导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致力于抵制人们在工作、社区、校园等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剥削和非正义等。

第三是社会主义联盟 (Socialist Alliance) 及其出版的《联结：社会主义复兴国际条例》(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杂志^③。社会主义联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极左翼政党，它声称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左派政党。2001年，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及其他六个社会主义组织联合成立该党。该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社会主义联盟参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气候变化、教育等运动，在难民权利、反种族主义以及公有制等方面，它持有极左立场。除了上述三个组织和杂志之外，其他杂志也持续了很长时间。^④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左派是非常碎片化的，包含一系列声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自身理解的小政党。这一区分也延续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旧有对立。如果一个杂志或一个政党自称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它们大多具有托洛茨基主义信念；而“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则暗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承诺。

那么，这些杂志的学术标准是什么？他们就此并未达成共识。一些杂志，诸如《联结》(最初在澳大利亚但后来具有国际影响)，很明显是非学术的，但关注层面非常广泛。其他的杂志，尤其是《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则会

①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Party_of_Australia_\(Marxist-Leninist\)](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mmunist_Party_of_Australia_(Marxist-Leninist)).

② 参见 <http://marxistleftreview.org/>。

③ 参见 <http://links.org.au/>。

④ 其中包括国际社会主义出版的《社会主义评论》(1990—1993)，以及澳大利亚共产党出版的《澳大利亚共产主义》(1963—2001)。

提供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与更加学术的《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学杂志》一样，所有这些杂志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将行动主义（activism）视为工作的一个固有纬度，尽管根据各自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在如何理解行动主义上面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他们试图践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改变世界”的要求。这一倾向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定期会议中，尤其是每年的“马克思主义”会议，这是澳大利亚激进左派最大的年度会议，每次会吸引上千名参会者。它由社会主义替代举办，也具有强烈的行动主义政治向度，而且在方式上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例如2018年的会议主题是“混乱世界中的激进观念”，会议特别围绕特朗普时代的反抗政治展开讨论。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每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会议则更为学术、小型，而且常常以分析资本主义为主导。

就内容而言，在一篇探究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关联的文章^①中，澳大利亚著名社会学家、科廷大学教授皮特·贝尔哈兹^②（Peter Beilharz）指出，作为一系列政治论争和西方文化合理的知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身体现现代社会的批判和解放旨趣。因而，应该关注马克思主义对澳大利亚激进学术的影响，其中包括社会学、文化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和激进运动等。

在社会学领域，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澳大利亚许多社会学学者关注阶级分析问题，例如斯图尔德·克莱格（Stewart Clegg）、杰夫·道（Geoff Dow）以及波罗·伯瑞汉姆（Paul Boreham）等人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而且，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共产党〔理论家E.W.坎贝尔（E.W.Campbell）〕、左派理论家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工人教育协会等对澳大利亚社会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澳大利亚学者还批判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存在反对全球化文化的浪潮。例如贝尔哈兹认为，在澳大利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正展现出强大和持久性，通过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其在股票交易、生产技术重组的跌宕中可以轻易地存活；透过消费能力，可以看出人们受到控制的程度，而后现代文化与市场的融合即是这

① Peter Beilharz, Australian Radical Scholarship in the Wake of Marxism, *Political Theory Newsletter* (1990) 2.1-9.

② 皮特·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澳大利亚著名社会学家：《论纲十一条》创办人之一，在文化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工人运动发展历史等领域有很高造诣。

一程度展现的最好信号。因此，他指责来自美国电影、电视、音乐等的文化渗透，认为这一方面引起民族反抗，另一方面又导致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乐观认同。在潜在的层面上，这种全球化文化导致了对澳大利亚本土传统和价值的外在冲击，也使得以实行多元文化政策著称的澳大利亚面临“认同焦虑”。近年来，由于移民国家的复杂性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认同政治也越来越受澳大利亚左翼学者关注，其中涉及原著居民、少数裔、难民等的权利和自治问题。

在澳大利亚的左翼思想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女性主义。伴随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比较具有影响的有“女性主义官僚运动”和“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等运动。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的压力任命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即展开。在学院领域，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借鉴福柯思想，试图将对现实权力的批判与实际的国家政策联系起来。另外，随着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等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播，“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为一体，综合法国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本土特征，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发展特点^①。1985年夏天，阿德莱德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创办了著名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研究》(*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杂志，旨在认识女性主义之间以及女性主义学术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之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综合本土资源和国际资源，提供关于思考澳大利亚文化批判和性别解放的独特方式。

目前澳大利亚多所大学设有性别研究中心。例如悉尼大学的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②，莫纳什大学的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③等。其中比较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有米亨·莫里斯、莫瑞亚·盖腾斯(Moria Gatens)、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雷温·康奈尔(Raewyn Connell)等人。现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关注更加广泛的领域。2017年6月7日到10日，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6届研讨会在莫纳什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女性与哲学：历史、价值与知识”，大会回顾女性在哲学中的历史贡献和现代贡献，并纪念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哲学发展过程中女性哲学家的思想贡献，在女性主义伦理学、美学、政治学以及认识论等方面探究全球化时代的性别正义。除了知识探究之外，澳大利

① 参见徐德林：《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国外文学》2012年第4期。

② 参见 https://sydney.edu.au/arts/gender_cultural_studies/undergrad/gender.shtml。

③ 参见 <https://arts.monash.edu/social-sciences/womens-and-gender-studies/>。

亚女性主义学者还对公共政策进行干预，致力于社会的性别平等和解放。在社会批判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危机，澳大利亚左翼学者致力于社会的批判性诊断和分析，以促进社会正义和进步。在这方面，左翼学者及研究机构不仅诉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还凭借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等思想资源。例如，2014年创办的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社会正义研究中心，负责人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教授尼科拉斯·科普赖迪斯(Nikolas Kompridis)。科普赖迪斯曾师从哈贝马斯，他的研究涉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浪漫主义和政治美学等领域。其代表性的思想是“反思性呈现”(Reflective disclosure)和“接受性”(Receptivity)理论，科普赖迪斯试图挖掘批判理论的美学和乌托邦解放的纬度，并著有《批判与呈现：批判理论的过去和未来》(2006)、《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2014)等书。自2015年开始，社会正义研究中心每年5月举办“社会批判理论悉尼流派”论坛，并邀请在社会批判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国际学者。该论坛历时两周，深入讨论国内外社会政治议题，旨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意义上促进有关社会正义的跨学科研究。例如2015年论坛包括“新自由主义、批判与抵抗”、“性别、种族和后殖民批判”、“宗教、世俗化和民主”、“移民、边界和安全”等研讨主题；2016年会议邀请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并扩展讨论基于澳大利亚本土的“去殖民化/跨国国际女性主义”、“暴力、创伤与和平”、“本土认同政治和主权”以及“国家间的难民”等问题。

由此可见，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澳大利亚左派来说，仍然面临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贝尔尼·塔夫特(Bernie Taft)所指出的，“与西方同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我们（即澳大利亚）的理论界还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以及左翼当前危机状况的严肃分析。关于现存制度的可能的替代形式，以及如何使之成为现实并且应该从上个世纪吸取哪些经验教训，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①除了无法给出充分的理论阐释之外，澳大利亚的左翼运动也是混乱且分散的，对现实政治的参与程度有限。这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跟澳大利亚的社会变化和现实状况有关，在此不再详细展开。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统一和系统的流派，它具有

^① 朱毅：《澳大利亚左翼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2期。

边缘化、碎片化、跨学科等特点，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和应用上带有强烈的本土特征。虽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澳大利亚处于边缘位置，但也成为当今澳大利亚左翼进行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来源之一。澳大利亚学者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研究领域相互结合，扩展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涵盖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扩大学术交往的范围和领域，致力于不同语境和内容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融合，从而形成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和批判，虽然这种批判是碎片化的；另一方面，围绕本土语境，澳大利亚左翼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试图为现实实践提出各种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替代性改革策略。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已经很多，但对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译介很少。对其进行探究有助于我们拓展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了解，并从理论和实践维度启发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和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